

“挤进”与“挤出”之辨

■ 张献国

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拉动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而挤出效应则是指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会抬升市场利率和形成与民间经济资金竞争,从而制约民间需求和民间经济的增长。当前,对于积极财政政策前期效果的评价,学界的主流见解是挤进效应属于政策的积极效应,应予充分放大,而挤出效应属于政策的负面效应,必须努力防止。

单从扩大内需的总量目标来讲,上述认识并无不妥之处。然而,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多重目标下的经济调控,其着眼点不仅在于提振总需求,保证经济的短期增长,更在于推进经济结构的协调与升级,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下一步经济调控应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于是,在结构调整的目标下重新审视挤进和挤出效应的是非优劣,我们会以下不同的认识。

挤进效应一定是好的吗?众所周知,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我国经济增长的痼疾,反映的是产业结构不合理。2004—2007年,我国一直在推进结构调整,抑制产能过剩。据有关人士分析,很多产业,如钢铁、水泥的过剩产能在2008年底本来已经调下去了,现在又出现反弹。其动力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政

府基础设施投资扩张带来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不会持久。如果企业以此作为长期趋势来扩大投资,一旦这类需求减少,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我国目前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凸显应引起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反思。在笔者看来,挤进效应并非总是好的,判断挤进效应是非优劣的标准,是要看“挤进”的是什么?如果“挤进”的产业伴随着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那就不一定是好的挤进效应。

挤出效应一定是不好的吗?这要看“挤出”的是什么?除非政府的财政扩张对民间经济产生超强的挤出效应,否则,首先被挤出的必然是那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竞争力相对较差的产品和企业。而真正适应市场需求、竞争力强的产品和企业往往也具有较强的抗“挤出”能力。在前者被挤出以后,后者则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要财政扩张保持适度,从而挤出效应不是很大,适当的挤出效应的存在可以起到优胜劣汰和结构优化的效果。这种情况下的挤出效应又有什么不好呢?

另外,对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出现的“国进民退”这种特殊的挤进和挤出效应也应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以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无疑对我国经济企稳向好起到了关键作用。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就是明证。但如果这些投资为国有经济独享,或过度向国有企业倾斜,则必然会扩大国有企业的控制领域和挤压民营经济的市场空间。这种现

象显然有违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总之,对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进与挤出效应,需要从总量调控、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等多个层面进行辩证分析。走出认识上的单一视角,可以为我国下一步宏观调控带来新的思路。其一,要把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如果说,从总量扩张的角度,为扩大挤进效应和防止挤出效应,需要财政政策全方位扩张和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的话,那么,以调整结构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则需要有不同的政策工具和政策配套。一方面,财政政策自身应加大结构性调节力度,如依据产业规划和市场供求状况,更多地运用选择性财政补贴、结构性税收政策(可以考虑恢复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定向政府采购等。另一方面,还需要辅之以针对企业行为的信息引导和适度的行政干预等手段的配合。其二,要把政策调控与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政府扩张投资的政策还应延续下去,但政府投资的安排必须立足于带动民间投资,避免政府投资的“单打独斗”。在操作上应尽力为所有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避免政府投资的国有企业偏向。基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的要求,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规范和调整,目标不外是做大积极财政政策好的“挤出”和“挤进”效应,而把其中不好的“挤出”和“挤进”效应降到最小,实现巩固总量调控成果与优化经济结构及推进市场化改革多重目标的兼容。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责任编辑 冉鹏